

吴宝康 著

档案学理论与 历史初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档案学理论与 与历史初探

吴宝康 著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吕华琦

封面设计：李文金

技术设计：杨丽娜

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

吴宝康 著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前进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3298·85

1986年9月第一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 309 千

印数 1—3,000 册 印张 13.25

定价： 3.10 元

内 容 提 要

档案学理论与历史是在加强档案学的理论研究所发展起来的一门新的学科。本书是对我国档案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以及档案学思想、原则、理论的发展历史所作的初步探讨。内容大体分四个部分：（一）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有关档案工作的言论和实践活动的初步探索；（二）档案学的对象、任务、性质、特点以及我国档案学的产生和发展；（三）建国以来我国档案学的研究及其今后发展；（四）档案学理论中关于档案和档案工作的产生和起源，档案工作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档案工作的性质、作用和特点，档案的利用等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本书对各级档案局、各级各类档案馆、机关、企业档案室从事业务实际工作和业务指导工作的同志，以及高等学校档案系、历史系档案专业的本科学生都是重要的专业参考读物，有帮助读者对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提高认识，增进知识，启迪思想的作用。

出版说明

本书是1981年写的，1982年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校内用书印行过，为适应当时各地需要，曾加印一部分内部发行。但仍不能满足档案界的需要，加之有关档案专业的读物本来就少，因此很多人希望本书能正式出版，扩大发行。

自本书印行以来，得到了档案界的一些好评，也提出过一些有益的意见和不同的看法，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作者的思想观点也在发展之中。本书此次正式出版时，作了一些必要的删改，但未作大的改动，主要是为了保持本书的特点，使在三十多年中，对从实践中提出的许多理论问题的研究及其历史发展的痕迹得到更多的保留，便于今后档案界同志们能更好地了解，并研究我国档案学理论发展的历史。一门新的学科的建设总是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不断努力。如果广大读者能从拙作中所提出的问题引起大家的思考和对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兴趣，有所启迪或帮助的话，那么我就感到已经很高兴了。当前档案学的理论建设已经成为一个十分迫切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问题，应该提到我们的工作日程上来，这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使命，也是实践的要求，通过本书的出版，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这也就是我的想法。

本书在正式出版前，丁永奎同志看了全稿，作了文字加工，特此感谢。

作者

1985年·12·

前 言

这本书的书名是《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写作本书的目的是想探讨我国档案学的思想和理论发展的历史以及有关档案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一般说来，档案学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虽然它已经基本建立和形成了自己的科学体系，但其成果还是初步的，还有不少理论、历史和实践问题尚待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和探讨。我写这本书的本意主要是为了适应档案系的本科学生和研究生教学需要，提供教材。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一本教材，一部讲稿。但是我又想，与其说它是一本教材和讲稿，倒不如说它是一本研究性、探讨性的书稿更为确切。出版这本书，只是企图通过它提出一些问题，同有兴趣研究档案学理论与历史的同志们，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共同切磋钻研，为建设和发展档案学贡献自己一点微薄之力；同时也希望能引起广大档案工作者对研究档案学理论与历史的兴趣和共鸣，逐步扩大我们的研究队伍，为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档案学而共同努力。

我研究档案学理论与历史，是从1957年开始的，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在过去研究《中国档案史》的基础上起步和发展起来的。当时我主要想在批判地学习外国档案学成果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批判地研究和继承我国自己的档案学历史遗产，总结我国自己的档案工作实践经验。1958年上半年，我第一次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的本科学生讲授了《档案学理论与历史》这门课。此后

的几年间，我又对档案学的若干理论问题作了一些探讨。但这项工作当时以至后来就已经受到左倾思想和某些政治运动的影响和干扰。当然更不用说十年内乱时，实际上中止了这方面的研究。在那“史无前例”的年月里，过去辛辛苦苦写下的几十万字的讲稿和积累起来的原始材料，几乎全都丢失了。这给1978年复校复系后我想继续从事此项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不过，还总算幸运地找到了1958年油印的一份《档案学理论与历史专题讲授提纲》，油印本《档案学基础》第十编《我国档案学的产生和发展》一稿以及其他一些论文稿，这又使我拾起了已搁置多年的讲授和写作宿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我深感，党中央深刻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为我们研究和探讨档案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创造了一个极其有利的条件。同时，党中央号召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清理“左”的思想影响，各行各业都要总结自己的经验，研究自己的理论。所有这些更是激励我下决心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三十多年来从事档案工作、档案教育和档案理论研究中的心得体会写出来，以供正在学习档案专业的同学们和档案界同行的同志们参考，作为引玉之砖，我想恐怕也是不无补益的。

《档案学理论与历史》是档案学研究中新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科目。在高等学校的档案专业中，它可以是一门单独课程。其研究内容，我想大体可以包括以下十二个方面：（一）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二）档案学的研究范围、构成及其内容，（三）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四）档案学的性质和特点，（五）我国档案学的发展历史，（六）外国档案学的发展历史，（七）档案学的各种概念、定义、思想、观点、原则和方法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演变和发展，（八）档案学不同流派的产

生、形成及其思想观点的研究，（九）档案学家的个人历史及其著作的研究，（十）档案学的历史遗产和档案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十一）档案学的发展趋向和前途，（十二）革命导师和领袖人物有关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论述和实践的研究。根据上述想法，同时又考虑到目前的实际情况，本书编写时暂分为四个部分，即：第一部分，档案学及其历史；第二部分，建国以来我国档案学的研究及其今后发展；第三部分，档案学的若干理论问题；第四部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与档案。应当说，即使关于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都还只是研究的开始，远没有完全解决，而且还很粗糙，对有些问题提出的一些见解和看法是否合适，也还需要继续进行探讨和研究。空白也还不少。随着档案学研究工作的不断扩大和深入，也必然还会补充和增加新的问题，现在还有许多理论问题来不及都写出来。本来我还计划写第五部分，外国档案学及其历史。但由于材料还较少，因此只能在今后从对外国档案学的代表著作进行评述入手，逐步积累材料，再作较有系统的研究，以期为探讨符合世界各国档案工作实际的原则方法及其发展规律的档案学，创造一点条件。这些就是我今后进一步从事档案学研究的课题和方向。我很希望自己还能有机会利用余年实现这个愿望。

研究档案学的理论与历史，对于档案学建设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档案学的理论与历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建国以来，我国研究档案学及其各科目的过程，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我国档案工作的历史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应当说，这个结合的过程，现在还刚开始，有些方面还只是在试探和探索中，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但它确实是开始了。大家知道，建国前，我国档案学的研究还仅处于业务技术方法的

专门知识的研究阶段。要把档案学从业务技术方法的经验性的科学变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有理论性的档案科学，只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把马列主义理论与档案工作的历史 and 实际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建设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但是，要真正较为系统地、较为成熟地把档案学建设成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有理论性的档案科学，没有几代人的长期努力钻研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们的艰巨任务。我相信，对档案学理论与历史的研究，在实现这一任务中必将起着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既然这本书只是对档案学的理论与历史进行一些探索性的研究，同时也由于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各方面知识水平不高，认识也会有局限性，因此毫无疑问，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稿，其中不妥乃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一定不少，在此我由衷地期望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我想，要繁荣和发展档案学，不断推进我国档案事业的建设，就应具有进行理论探索，攀登科学高峰的勇气，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创新，著书立说。正确的就坚持，也不要怕犯错误，错了就改，再错再改，坚持不懈地努力，这是我们每个科学研究工作者应取的基本态度。

由于档案学的许多理论问题的研究都是互相联系的，而且档案学的理论研究又尚处在探索之中。同时，有一些内容是利用了我过去的论文、讲话和报告等写成的，因此本书在某些问题的论述中，难免有某些重复现象。虽然在编写和修改本书过程中曾已尽量注意避免，但也仍未能完全如愿，对此亦希望得到读者的谅解。

这本书是我长期积累和研究的结果，但仍是不成熟的。我写这本书具体执笔时间是始于1981年2月，止于8月中旬，前后大约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写出初稿。在编写过程中，我曾吸取和引用了

有关学科的某些成果和材料，在个别地方还引用了某些同志发表的文章和其它有关材料。初稿写成后，丁永奎、严鑫根同志看阅了部分书稿，提了有益的意见。王德俊同志为本书全稿作了文字上的加工整理，并对某些地方作了补充。王道宏同志也看阅了本书全稿，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对上述诸位同志所给予的帮助，在此我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今年11月正好是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成立三十周年，聊以此书稿的印行作为一个献礼。

作 者

1982年1月16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与档案	1
第 一 讲 马克思、恩格斯与档案	1
第 二 讲 列宁与档案	31
第 三 讲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以及其他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档案	73
第二部分 档案学及其历史	104
第 四 讲 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	104
第 五 讲 档案学的性质和特点	114
第 六 讲 档案学理论与档案工作实践的关系	127
第 七 讲 关于档案学某些观点的我见	137
第 八 讲 我国档案学的产生和发展	154
第 九 讲 建国前和建国后档案学研究的基本特点	191
第三部分 建国以来我国档案学的研究及其今后发展	214
第 十 讲 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档案学的创建和 发展	214
第十一讲 我国档案学研究 and 发展的曲折道路及其 主要问题	222
第十二讲 对档案学研究和发展中若干问题的认识	238
第十三讲 我国档案学及其各科学科目的今后发展	258
第十四讲 档案学科学研究干部队伍建设	281

第四部分	档案学的若干理论问题	300
第十五讲	档案和档案工作的产生和起源	300
第十六讲	档案工作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316
第十七讲	档案工作的性质、作用和特点	345
第十八讲	关于“以利用为纲”的问题	355
第十九讲	集中统一管理原则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	383
第二十讲	重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努力建设档案事业和档案科学	390

第一部分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与档案

第一讲 马克思、恩格斯与档案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以及我国其他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们伟大的革命实践中创造了并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理论，成为我们继承、学习和运用于指导当前革命事业的极为宝贵的精神遗产和思想财富。档案工作虽然在整个革命的事业中来说，仅是一项很具体的工作，也就是说是一项很具体的革命事业，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在他们的一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也经常与档案和档案工作有着不少的联系和接触，特别是利用档案，甚至实际上也做了许多档案工作，发表了许多有关档案工作的言论，反映出他们不仅十分重视和关注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而且对档案工作的业务问题也有许多值得珍视的思想、见解和意见。尽管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不是很容易能够发现和找到，不能像其他理论和历史学科那样材料丰富，翻书即见，俯拾皆是，但也不能说材料一点也没有，而是相当丰富的一份研究档案学理论的遗产。问题是还有待我们继续艰苦地去寻找和发现，积累和整理。建国以来，由于档案界全体同志以及我们自己的努力已经积累了一些有关材料，现根据这些材料加以综合和分析研究作为我们对档案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方面的尝试。

马克思（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的革命导师和领袖。在谈到马克思的伟大功绩时，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是“科学巨匠”，但是“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从1844年8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在法国巴黎会见，从此，两位伟大革命导师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一直并肩战斗终生。《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是一部阐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来源——剩余价值理论，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和经济运动规律，以及资本主义必亡、共产主义必胜的不朽巨著。马克思为了写这部巨著花费了差不多四十年的时间，他的大半生的精力，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起直到他逝世（1883年）。早在1843年底，即与恩格斯第一次会见之前，马克思就已在巴黎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本来是学法律的，而且爱好哲学和历史。要问推动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最初动因是什么”？对此马克思自己有过说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正是为了从理论上回答这种有关物质利益的“难事”，促使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问题。马克思当时曾利用《莱茵报》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进行论争。并从1843年起，马克思才“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以主要精力研究政治经济学，直到1883年病逝。“他研究经济文献（即档案文件材料和档案文件汇编等——引者注）的目的，是要写一部批判现存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资本论》注释）他在这方面进行的最初的研究反映在以下这些著作里：《1844年的经济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等等。在1848—1849年的欧洲急风暴雨般的革命（以法国为中心，仍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当时欧洲大部分国家仍然处于封建专制制度的统

治之下，即使经过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国，封建势力依然存在，政权并不掌握在整个资产阶级手里。因此欧洲大陆上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使马克思暂时中断了经济学的研究，同恩格斯一起回到德国，在科伦创办《新莱茵报》。革命失败后，于1849年5月被逐出普鲁士，先到巴黎，后于1849年8月，马克思被迫侨居英国伦敦，在那里他才继续进行研究。从那时起，他年复一年地经常在伦敦的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里，博览包括档案在内的各种材料，进行悉心研究。1851年6月27日，马克思从伦敦写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说：“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我通常是在英国博物馆（指博物馆的图书馆——引者注）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多得要命，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还是不能在六至八个星期之内结束这一工作。而且常常有各种各样实际干扰，这是在贫困条件下过日子所不可避免的。但是‘不管这一切的一切，’工作很快就要结束。无论如何应当在某一天把它结束。民主派的‘头脑简单的人们’靠‘从天空掉下来的灵感’，当然不需要下这样的工夫。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用钻研经济和历史资料来折磨自己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82页）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相当生动具体地了解到马克思当年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中，为研究经济学，写作《资本论》而研究材料的情况。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里完成的，因此马克思对这所图书馆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马克思曾说：“我已经大约两个星期没有写东西了，因为，当我不在图书馆的时候，……无论有多么好的愿望，也总是不能动笔。”由此可见马克思与图书馆的关系是何等亲密。在欧洲各国，当时和现在的著名图书馆或博物馆中常常也保存有档案文件以及档案文件的汇编材料。因此马克思在图书馆收集和研究文献材料，其中大多就是档案文件或档案汇编。英文中的Document，可译公文、文件、文献，即

档案，与Archive档案馆、档案室、档案、案卷；Record，记录、案卷、档案等，其意思都是相通的。我们知道，马克思由于长时期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里看阅材料，利用档案，因此相传，在阅览大厅里他所常坐的椅座前地上有两个深陷的脚印，当然这个传说不一定是可靠的，但是，马克思在那里曾倾注了全部的革命热情，花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去收集包括档案文件在内的各方面的材料从事科学研究，确是事实。他亲自做各种调查研究，访问贫民窟，了解工人生活和斗争情况，编写工人调查表，他还大量收集和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料，以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有关材料，如技术史、农业化学、地质学、工艺学等。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过程中所阅读的有关书籍和报刊达1500多种。马克思当年在伦敦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他必须不断地同贫困作斗争并且时常要为挣钱维持生活而搁下研究工作。他呕心沥血、废寝忘食，每天工作15—16小时，精心研究，由于马克思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长期过度劳累，因此产生了恶果，他身患重病。虽然如此，到1857年，他已经做好巨大的准备工作，这就使他能够开始进入研究工作的完成阶段——对收集的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概括。从1857年8月到1858年6月，马克思写了约五十印张的手稿，看来这是未来《资本论》的草稿。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本书出版了。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里又重新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1861年8月，又开始书写篇幅巨大的手稿和笔记，到1863年年中才完成，手稿和笔记共二十三本，约二百印张，标题与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同。1866年后，又决定不分册出版，改为基本上完成全部著作再出版。为此，马克思继续致力于自己的著作，特别是致力于1861—1863年手稿中还没有得到充分阐述的部份。他补充了大量的经济文献和技术文献，其中有关于农业、关于信用和货币流通问题的文献，他

研究了统计材料、各种会议文件、关于工业中的儿童劳动和英国无产阶级居住状况的官方报告等等。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档案材料。1863—1865年底他就完成了长达二百多万言的三卷《资本论》的全部草稿。后又经过他的精心整理和反复修改，终于在1867年9月，不朽巨著《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继续从事《资本论》其他各卷的修改工作，他打算迅速完成全部著作，但是他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许多方面的活动占去了他很多时间，另一方面，由于健康状况不好，他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中断他的工作。《资本论》的后两卷，是在马克思于1883年3月14日逝世以后，由恩格斯花了多年时间进行整理，准备付印和出版的。第二卷于1885年出版，第三卷于1894年出版。这是恩格斯对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宝库作出的无可估量的贡献。

马克思从1849年被逐出巴黎直到1883年因病逝世，一直住在伦敦。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是马克思主要从事研究的场所。他除了在这里完成他的《资本论》初稿外，他的其他名著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等都是在伦敦撰写的。马克思在这里研究了国民经济史和各国特别是英国的经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土地所有制的历史材料、地租理论、哲学、历史、英国工业史等，博览了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的大量藏书和档案资料。正如1894年列宁曾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中提到的：“马克思在四十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就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二十五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把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极详尽的分析”（《列宁全集》第一卷第121页）。马克思就在